

“天降嘉种”:释甲骨文“𥽿”并补释“糯”

——兼向曾雄生诸君请教

苏成爱

(安徽财经大学 历史文化研究所,安徽 蚌埠 233030)

【摘要】甲骨文中农作物用字的考释问题,一直是上古农史研究中重要的基础性课题,疑义颇多,尚须继续探讨。本文尝试通过科技史和汉语史的证据揭示甲骨文中的“𥽿”是“𥽿”而不是“𥽿”。通过对甲骨文中农作物用字及相关文献的考察,可知上古时期人们对农作物良种十分重视,良种作物往往被赋予独立的名称和专门的用字;而以殷王为代表的统治者对产量低但更适宜酿酒的糯性农作物品种格外重视,在甲骨文中留下的记录较多,具有鲜明的阶级性。

【关键词】甲骨文考释;𥽿;糯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24)05-0041-15

"The Fine Varieties of the Godsend ": An Interpretation of "Ju(𥽿)" and Supplementary Interpretation of Nuo(糯)in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SU Chengai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ngbu 233030)

Abstract: The research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characters for crops in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has always been an important basic topic in the study of ancient agricultural history. This paper attempts to reveal that "𥽿" in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is "𥽿" rather than "𥽿" through the evidence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anguage. Based on the study of the characters used for crops in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and related documents, it can be seen that in ancient times, people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fine varieties of crops, and fine varieties of crops were often given independent names and/or special characters. The rulers represented by King in Yin dynasty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glutinous crop varieties with low yield but more suitable for wine making. There were many records left in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which had a distinctive class character.

Key words: interpretation of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Ju(𥽿); Nuo(糯)

多年前,笔者曾撰写过一篇冗长的小文,尝试考释了两个密切相关的甲骨文:该文前半部分和后半部分分别考释了自认为是“糯”和“𥽿”的文字,文中分别用N和J代替。其中,考释N的前半部分《“殷尚

【收稿日期】2022-09-3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宣纸传统制作技艺抢救性挖掘整理研究”(10& ZD08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新出土孝经类文献整理研究”(23BZS015)

【作者简介】苏成爱(1978-),男,历史文献学博士,安徽财经大学历史文化研究所特聘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古文字、古文献以及农牧业起源研究。

醴”:释甲骨文中的“糯”》(以下称《糯》)^①,业已公开发表向学界求教。近见曾雄生先生发文《论甲骨文中“糯”字的可能性》(以下称《拒》)^②指出,N不是“糯”而是“拒”,对《糯》提出了非常有价值的质疑。质疑的产生,或许也与笔者没有披露小文下半部分观点有关,故而本文拟在披露小文下半部分观点的同时,对曾文的质疑进行讨论,一并向曾先生和读者诸君求教。

为了便于讨论,下面集中列出相关的古文字:

J1.𪛗(《合》9946 宾一)J2.𪛗(《录遗》397 商末周初)S1.𪛗(《合》9951 典宾)S2.𪛗(《合》837 典宾)D.𪛗(《合》9948 典宾)N.𪛗(《合》10005 典宾)

N与J都是卜辞中构形特殊的粮食作物用字。甲骨文中代表粮食作物的合体字大多从“禾”或从“来”,但是N与J既不从“禾”也不从“来”。它们都出现在宾组卜辞中,又都与被很多学者以及笔者释为“稻”的甲骨文(D)对贞。N与D对贞的语例较多,兹不列出;卜辞中以“受J年”与“受D年”对贞的语例如下:

己巳卜,穀贞:我受D年。[在]断。

己巳卜,穀贞:我弗其受D年。

贞:我受J年。在断。

𪛗弗[其]受J年。(《合》9946 宾一)^③

与J密切相关的N,是殷商卜辞中出现频率特别高而又特别难以释读的粮食作物用字,100多年来让学者们伤透脑筋,确需进一步深入探讨;曾先生的质疑价值甚高,且问题十分复杂,本文用了较多篇幅就N的考释问题进行讨教,故而未能充分照顾到正文各主要部分的篇幅均衡,望读者诸君海涵。

一、N是甲骨文中的“糯”而非其它

据统计,N是甲骨卜辞中出现频率第三高的粮食作物用字^④。偶见有论者认为N不是农作物,这显然与甲骨卜辞的辞例不合。这种看法的产生,与以往论者大多将之释为某大类的农作物却又都难以自圆其说有关。笔者不得不尝试另辟蹊径,将这一特殊的涉农甲骨文释为所代表之作物有“酒稻”之称、所代表之粮米有“酒米”之称的“糯”字,这与自西周以来言稻常及糯的语言习惯相吻合。

曾先生与笔者虽有分歧,但现已达成了一些共识:殷商时期既存在非糯性谷物,也存在糯性谷物,当时的粮食作物有稻、糯、黍、秬等,用糯性谷物酿造的粮食酒有醴、鬯等。当前我们分歧的焦点在于,殷商时期栽培和种植的糯型作物(特别是糯稻)的多寡、时人对糯性谷物的认识和重视程度、醴酒的主料等在多大程度上支持甲骨文中存在代表糯稻的专用字。现拟从科技史和汉语史两个角度来探讨。

(一)从科技史的角度来看,N是甲骨文中的“糯”

1.殷商辖区具有源远流长的水稻栽培与稻米酿酒的历史,具备种植供殷王御用的各种类型水稻的条件:论殷王以稻米为食、糯米为醴的必然性

“醴”是上古时代使用原始、简单的方法酿造的低度甜酒。笔者在《糯》中提出,殷人活动区域悠久的栽培水稻和稻米酿酒的历史足以使殷商时代的殷都已经发展出糯米造醴技术,因为早在距殷商时代超

① 苏成爱:《“殷尚醴”:释甲骨文中的“糯”》,《中国农史》2022年第1期。

② 曾雄生:《论甲骨文中“糯”字的可能性——与苏成爱先生商榷》,《中国农史》2022年第2期。

③ 一说,J字又见于《合》10962:“贞……J(?)……”因卜辞残缺过甚且文字难以辨认,难以援引为据进行考释。文中所引《合》系郭沫若等编:《甲骨文合集》,中华书局,1982年;所引《录遗》系于省吾编:《商周金文录遗》,科学出版社,1957年;所引《补》系彭邦炯等编:《甲骨文合集补编》,语文出版社,1999年。

④ 彭邦炯:《商代农业新探》,《农业考古》1988年第2期。

过5000年的贾湖遗址就已经出现了以稻米为主粮和稻米造酒的证据。曾文质疑:当时“农业尚不是生计的主要来源,何况稻米呢?”实际上,贾湖遗址可分为三期九段,不同阶段的农业发展水平是不一样的。在初期贾湖先民生计以渔猎为主,采集为辅,农业确实不是生计的主要来源,稻米更不是;此后不断发生变化,到了后期,即从第六段开始,“稻作农业的产生与发展,使得水稻逐渐成为人们食物中植物类的主体”^①。

为了证明殷墟等殷王辖区所产稻米产量足以供应人们酿造糯米醴酒,《糯》提出较为激进的观点,指出稻米是商代先民的首要主粮,还援引张雪莲诸君对古人食物结构的研究论文。《秬》指出《糯》援引此文进行论证时曲解了原作者的意思。经查《糯》确实有此谬误,在此多谢曾先生教正。不过,曾文认为黍是“殷商时期最主要的粮食作物”值得商榷。现在学界已经形成定论:虽有统计结果表明黍在甲骨文中出现的频率最高,但产量极低的黍肯定不是当时排名第一的粮食作物。裘锡圭、何红中、惠富平、宋镇豪诸君都已指出,考古成果也可为证,早已成为共识^②。张雪莲诸君的研究结果仍然对于《糯》的考释结果有利。研究表明,相比于殉人,作为高级军事贵族的墓主人,其食物结构中C3类植物的比例明显较多^③。可供日常食用的C3类植物中,有粮食作物的麦、稻,还有瓜果蔬菜等。瓜果蔬菜不是主食,在食物结构中的比例很小,同时考虑到麦在当时是“较为希(稀)贵之品”^④,殷商时期中原地区的小麦种植尚处于推广种植的初始阶段^⑤,水稻的种植技术和稻醴酿造技术较为成熟,而稻米和稻醴口味颇佳,因此我们可以推知以殷王为代表的贵族统治者更有机会经常食用稻米并饮用用稻米酿成的酒品,稻类食物和饮品有可能是社会地位高的殷人的专享物。甲骨文主要反映的是殷王的意志与喜好,即使稻作物种植数量稀少,但若能够得到殷王的垂青,相应的文字也具备频频出现于甲骨文中的条件。至于商代先民首要主粮是什么,尚需作进一步研究。如,赵志军先生指出,稻与粟非常有可能是殷代最普通的农作物^⑥,这一见解值得关注。尽管这一问题尚无定论,笔者在《糯》文中提出向读者诸君请教的激进观点之后,指出无论这一看法能否成立,现有的研究成果还是足以支撑文章的考释结果的:“水稻即使不是首要的粮食作物也应该是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而大量的考古成果也表明,水稻是殷墟先民种植的重要粮食作物之一。”

一般认为,殷商时代属于“中国全新世大暖期”晚期的亚热带季风气候,足以支撑殷商种植足够的水

- ① 胡耀武、James H. Burton、王昌燧:《贾湖遗址人骨的元素分析》,《人类学学报》2005年第2期。胡耀武诸君还指出:“贾湖遗址出土的大量炭化稻和稻壳印痕,表明那里已存在着颇为发达的稻作农业,很可能是中国稻作农业的发祥地之一。”早有学者据此得出与笔者此前相同的结论,详参王建文:《性别角色与社会习俗研究——以贾湖遗址为例》,载上海博物馆编:《上海博物馆集刊》第12辑,上海书画出版社,2012年,第436-461页。
- ② 详参裘锡圭:《甲骨文中所见的商代农业》,载裘锡圭:《裘锡圭学术文集第1卷·甲骨文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33-269页;何红中、惠富平:《中国古代粟作史》,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年,第31-33页;宋镇豪:《夏商风俗》,上海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172-173页。水稻的亩产量是粟的2倍多,粟的产量是糜子产量的2倍。后魏贾思勰《齐民要术·黍稷篇》云“凡黍,粘者收薄”,可供酿酒的黏黍的亩产量比糜子的产量还要低,种植面积也比前者少。据统计,1978年全国水稻平均亩产是265千克,谷子(粟)是103千克。黍类作物在全国范围内的种植数量很少,目前未查得该作物在全国平均亩产,目前查得唯一可资参考的数据是黄土高原地区的。据1985年该地区亩产统计数据,谷子(粟)的平均亩产是114千克,糜子(不黏黍)的平均亩产是57千克。详参王曙光、王丹莉:《维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论》,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66页;杨文治、余存祖主编:《黄土高原区域治理与评价》,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73页。黍在我国古代都是富贵者所享用的“贵食”,甚至直到民国时期我国北方仍然是“富人皆食黍,贱者食粟”。详参吴稚晖:《吴稚晖全集·卷13·杂著1》,九州出版社,2013年,第13页。
- ③ 张雪莲等:《殷墟54号墓出土人骨的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考古》2017年第3期。
- ④ 胡厚宣:《卜辞中所见之殷代农业》,载胡厚宣:《甲骨学商史论丛》(二集上册),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1945年,第273页。
- ⑤ 任文洁、刘兴林:《从卜辞“来”“麦”谈殷商小麦的推广种植》,《中国农史》2021年第5期。
- ⑥ 赵志军:《关于夏商周文明形成时期农业经济特点的一些思考》,《华夏考古》2005年第1期。赵文在结论部分指出:“早在上个世纪40年代,胡厚宣先生就曾断言,‘黍与稻者乃殷代最普通之农产物’,现在看来,如果将黍换成粟,这一推断应该是非常正确的。”

稻供给殷王御用,而曾文认为当时黄河流域的气候类型是“暖温带干凉气候”。即使如此,盘庚迁殷后的黄河流域种植足以供给殷王享用的水稻和糯稻还是没有问题的。糯稻耐冷和耐旱都比非糯稻强,殷商时代在黄河流域种植不成问题。

某种粮食作物用字在甲骨文献中出现的可能性与出现的频率,关键在于它能够获得的殷王的重视程度。有意思的是,在105则内容较完整的、占卜“稻”和“黍”卜辞中^①,占卜这两种作物的卜辞,数量分别是55、50,由此可见殷王对“稻”和“黍”的重视。究其原因,“稻”是上古所有常见粮食中口味最佳的一种,可以作为美食的主料,而“黍”可以作为美酒的主料。甲骨文中笔者考释为糯的N,被认为是出现频率第三高的农作物用字。如果鄙说在关键问题上无大误而这一说法能够成立的话,这也易于解释,“殷尚醴”,这体现了以殷王为代表的统治者对酿造甘醴的主料糯米的高度重视。

2.“殷尚醴”与“黍酒糯醴秬鬯”:从醴受到的尊崇、酿造的首选主料以及与罍(罍)的关系看N的考释问题

《礼记·明堂位》云“殷尚醴,周尚酒”,出土文物也可以印证的这一记载的真实性^②。此处的“酒”和甲骨文中大多数的“酒”,都是专名而非共名。与作为专名的“酒”相比,“醴”是一种酿造方法较为原始、酒精度更低、保质期更短的酒品。

据研究,通常情况下,商周时期“醴”和“酒”这两种酒品的酿造主料和酿造方法完全不同。

西周初年已经出现了表示糯稻和糯米的专名“稌”。《诗经·周颂·丰年》云:“丰年多黍多稌……为酒为醴,烝畀祖妣。”“稌”在《诗经》中仅此一见,二千年来训诂学家们一直没有弄清楚它究竟是稻类的共名还是糯稻和糯米的专名。游修龄先生利用《山海经·南山经》“稻”“稌”并举的语例较为有力的证据证明了主要用于祭祀的谷物“稌”,其义为糯,是糯稻和糯米的专名,与“稻”不同^③。笔者想补充的是,《山海经·海外东经》所记“(黑齿国)食稻啖蛇”“食稻使蛇”,《海内经》所记“(广都之野)爰有膏菽、膏稻”,都表明当时“稻”主要用于食用,与语义为糯米的“稌”不是同一概念,人们已经分得很清楚。

《山海经》之《山经》部分的撰成年代下限是战国^④,但从内容上看它“基本上是一部反映当时(大禹治水至夏启建国之时)真实知识的地理书”^⑤。考虑到祭祀之礼往往具有严重的滞后性,即使此部分全部都撰成于战国时代,我们也应该把这种祭礼视为战国以前就出现了的风俗。再考虑到《山海经》多有可与甲骨文印证之处,将这一祭礼视为殷商风俗,或也无大碍。游修龄先生也有相近的看法:“《诗经》和《山海经》所记的以糯米供祭祀,当然不局限于周代,而实在是很悠久的传统承袭。”^⑥

游先生还揭示了《诗经》中称为“稌”的糯稻米正是造“醴”的主料,与造“酒”主料用的“黍”不同^⑦。曾先生也赞同这一看法^⑧。

《周颂》各篇都是西周初年撰成的诗作。其中的《丰年》一诗透露出的西周初年的先民们“造醴以糯,造酒以黍”,显然是继承自前朝,游修龄先生^⑨、郭宝钧先生也认为殷代即是如此^⑩。黄金贵、黄鸿初诸君

① 于省吾:《商代的谷类作物》,《东北师范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7年第1期。

② [日]内田纯子:《商代的酒器与青铜礼器》,载陈光祖主编:《金玉交辉:商周考古、艺术与文化论文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3年,第69-92页。

③ 游修龄:《稻作文字考(二):稌、秬和糯》,《浙江农业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

④ 刘钊:《出土文献与〈山海经〉新证》,《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1期。

⑤ 谭其骧:《〈五藏山经〉的地域范围提要》,载中国《山海经》学术讨论会编:《〈山海经〉新探》,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第13页。

⑥ 详参游修龄主编:《中国农业通史(原始社会卷)》,中国农业出版社,2008年,第199页。

⑦ 游修龄:《稻作文字考(二):稌、秬和糯》,《浙江农业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

⑧ 游修龄、曾雄生:《中国稻作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59、421页。

⑨ 游修龄主编:《中国农业通史(原始社会卷)》,中国农业出版社,2008年,第199页。

⑩ 郭宝钧:《中国青铜器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第115页。

也持此观点^①,未见有异议者。甲骨文资料似乎也可印证商代后期的先民也是“造醴以糯,造酒以黍”。殷商“造酒以黍”在卜辞中有充分的体现。甲骨文习见“酒”“黍”连文,如“乙未酒黍登”(《合》11484)、“酒黍登乙祖”(《合》32534)、“酒黍登乙亥”(《合》33836)、“酒黍登辛亥”和“辛酉酒黍登”(《合》21221),这都说明殷商时期“酒”确实是以黍为主料酿造而成。至于殷商时期殷王所用“醴”的酿造主料,卜辞中没有明确记载,但以西周初年的《丰年》诗句为例,商代晚期,即出现大量涉农甲骨文的时期,“醴”也是以糯稻米为主料酿造而成,因为糯稻米所酿造的醴酒无论是风味还是酿造的容易程度都要比其他稻米和其他糯性谷物优异^②,并因此得到殷王的垂青,故而频频出现于甲骨文中。当然,在没有糯米的情况下,非糯稻米和糯性的黍、粟都可以用来酿造醴酒,但在上古时代的大多数情况下,糯米还是达官贵人们酿造醴酒的首选主料。“醴”前不加任何限定性语素,人们就会默认为是“稻醴”,指的就是糯性稻米酿造的低度甜酒。古代文献中记载的“黍醴”“梁醴”对于达官贵人们来说,只是他们很少垂青的特殊而少见的类型,故而在“醴”前加上限定性的成分。这正如今天的粽子:一般的“粽子”都是使用糯米为主料制成的,但有时会因为缺少糯米或特殊的喜好而改用其他主料制作,就会为之赋予特殊的名称,如以非糯的粳米为主料制成的粽子称为“粳粽”,以黍米为主料制成的粽子称为“黍粽”。

作为专名的“酒”常与“醴”并举,二者是两种不同酒品,通常情况下,它们除了酿造的主料不同,酿造的方法也不同。《尚书·说命》记殷商造酒之法云:“若作酒、醴,尔惟曲、蘖。”宋应星《天工开物·酒母》“古来曲造酒,蘖造醴”正可视为此句的注脚。商代的先民酿造的粮食酒,以曲法造“酒”,以蘖法造“醴”:“酒”是以谷物为主料、用发霉谷物制成的酒曲为糖化剂酿造而成,“醴”是以谷物为主料、用发芽谷物制成的芽蘖为糖化剂酿造而成。以“若作酒、醴,尔惟曲、蘖”例之,也可以推知“多黍多稌”“为酒为醴”所表达意思是,西周初年的先民“造酒以黍,造醴以稌”。“稌”即是“糯”,“稌”“糯”是义同音近的同源字(详后)。

《山经·中次五经》讲到祭祀首山的山神魍除了交待祭祀用的粮食是“稌”之外,还交待了祭祀用的酒品是“蘖酿”。关于“蘖酿”,郭璞注:“以蘖作醴酒也。”“稌”与表示醴酒的“蘖酿”连文,此处名为“蘖酿”的醴酒显然是用稌(糯)米酿造的醴酒。这表明,上古时期的“醴”一般是以糯稻米为主料,使用蘖法酿制而成。

殷商时代的主要粮食酒只有“酒”“醴”“鬯”三种,这是以殷王为代表的统治者宴饮和祭祀所用的主要酒品。殷商时期通常造醴以糯,造酒以黍,造鬯以秬。其中,只有蘖法酿制的“醴”,与罍(坛)的关系最为密切。与其他二种曲法酿造的酒品相比,“醴”其保质期最短,用来酿造的罍通常既是酿酒器,也是储酒器、饮酒器^③。N从“覃”(𡇗)从“米”,故可推知它代表的是一种能够产出殷王最常用于酿造“醴”的谷物的农作物,即糯稻。“酒”得名于用于储藏这种酒品的酒器“酉”,“酉”亦作“酒”的声符;如果N是甲骨文中的“黍”字的话,那么该字似当从“酉”而非“覃”;如果N甲骨文中的“秬”字的话,其下部所从代表酒器的部件,似当是能够昭示它与鬯酒之间密切关系的“鬯”,一如金文之例。西周金文“秬”写法有多种,或以“巨”为声符,或以“夫”为声符,或同时以“巨”与“夫”为声符,但义符都是“鬯”。

因此,从不同酒品酿造所用的首选主料以及与之关系密切的酒器来看,释N为“糯”似具有排他性。

3. 甲骨文农时的可靠性与N的考释:释N为“糯”具有排他性的另一证据

把N释为“糯”,是唯一一种能够在农时上完美吻合的考释结果。利用农作物的农时因素来判定涉农甲骨文代表的是何种粮食作物,是一种较为常用而成熟的考释方法。

曾文认为运用这一方法缺乏说服力,并提醒了三点,其中的一点笔者在《糯》的注释中已经说明,另

① 黄金贵:《古代文化词义集类辨考》,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895页;黄金贵:《古代文化词义集类辨考(新1版)》,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596页;黄金贵、黄鸿初:《古代文化常识》,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2017年,第125页。

② 《齐民要术·法酒》论稻米造酒云:“糯米大佳”。《仪礼·聘礼》“醴黍清,皆两壶”,汉人郑玄注:“凡酒,稻为上,黍次之,粱次之。”宋人何刻《酒尔雅》云:“上尊,糯米酒也;中尊,粳米酒也;下尊,粟米酒也。”

③ 刘莉等:《从平底瓶到尖底瓶——黄河中游新石器时期酿酒器的演化和酿酒方法的传承》,《中原文物》2020年第3期。

外两点:一是占卜时间未必是播种时间;二是以相隔时间判定农作物的种类依据不足^①。对于这两点,笔者的看法是,虽然占卜时间未必是播种时间,但从大量的占卜记录来看,如果排除闰月因素的话,甲骨文中对同一种农作物播种和收获时间的占卜一般都是在某一固定月份,即使占卜时间与播种及收获时间有差距,这种差距也是较为固定的,且差距较短,可以忽略;且所载同一种作物收、种的时间差与该作物的生育期相吻合^②,这可从侧面证明利用不同作物的农时相隔时间判定农作物的各自种类是一种可靠的方法。

从甲骨文记载的农时来看,当时S(黍)与D(稻)的种植时间都是在殷历一月,传世文献中也不乏黍与稻的种植时间相同的记载^③,而N种植时间比D晚一个月,所以无论D是“稻”还是“黍”都对本文以N为“糯”的结论影响不大;而若以N为“秬”,而秬是黑黍,是黍的一种,而古今文献中对秬和普通黍种植时间的记载,都不见有对二者的时间差的刻意强调,当今现实生产中在同一地区秬与普通的黍种植时间也是大致相同的,并无一月之差,这是笔者不敢苟同“秬”说的一大原因。而甲骨文中的J与D同卜,正具备“秬”的农时条件(详后)。

4. 殷商糯性谷物的名与实:释N为“糯”的旁证

曾先生与笔者都认为殷商时期已经存在人工栽培的糯性黍类和稻类粮食作物,分歧的焦点在于这些作物及其所产谷物是否被严格地突出出来,是否具有各自专门的用字。

笔者认为,殷商糯性谷物已经被严格地突出出来,并造出了相应的专门用字。究其原因,糯性谷物在以殷王为代表的达官贵人心中具有异乎寻常的重要地位。曾先生赐教,殷商贵族们对饮酒较之于吃饭更为关心,且酿酒的主料一般是糯性谷物。这决定了糯性谷物在殷王等上层人物心中的崇高地位以及造出相应文字的必要性。上古先民对与自己衣食住行密切相关的动植物的重视程度远超今人,他们往往会对具有不同特点的同一种动植物赋予专门的名称,并造出专门的用字。如上古时期的马匹十分重要,仅《诗经·鲁颂·駉》一篇就罗列了古人为各色良马创造的专用字16个。殷商时期人们对重要的动植物的区分比现今还要细致。甲骨文中“羊”“隹”“虎”“鹿”都有从“土”与从“匕”之形,分别表示这几种动物中的雄性与雌性。甲骨文往往用具有不同形体的字表示具有不同特点的同一种农作物。如,甲骨文中的“黍”大多形如S1,表现的是结穗了的黍的全株的形象;而“香”等字所从的“黍”上有数个点画,形如S2,强调的是黍的种子。在代表小麦的甲骨文中也存在类似现象^④。文字中对其所代表的生物作如此细致严格而又明显的区分,在后世很难见到。

认为殷商时代糯性作物和谷物有实无名,恐怕是一种错觉。造成这种错觉的“罪魁祸首”是汉语中的“大、小名同辞”现象。大、小名同辞,不能以小名(专名)为大名(共名),但小名却极易被误以为是大名。

清人程瑶田就曾揭示黍类作物“大、小名同辞”现象:“黍,大名也,黏者得专黍名;其不黏者,则曰糜,或曰稊。”^⑤“黏者得专黍名”,则以“黍”称黏黍,此“黍”为小名。

① 我们没有单纯根据月份来判断相关农作物的种类,除了因为现有的研究成果无法帮助我们确知相关月份与现今公历之间的对应关系,还因为我们无法确知当时的气候状况及其对水稻农时的影响。水稻的种植时间与气候密切相关,如我国的海南省一年365天每天都可以种稻,而黑龙江省每年只能种一季稻。

② 王星光、张军涛:《甲骨文与殷商农时探析》,《中国农史》2016年第2期。

③ 如,[唐]瞿昙悉达《开元占经》卷111引《神农书》云:“夏至前五十日可种稻、黍、糜”。方志中也不乏类似记载,如县志记载东北地区“芒种种黍及水稻(粳稻)”。详参于云峰纂,孙化龙校注,《[民国]安东县志》,辽宁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330页。《诗经·大雅·生民》“蓺之荏菹,荏菹施施,禾役穰穰,麻麦幪幪”,明何楷《诗经世本古义》卷10云:“经先言荏菹,次言禾,次言麻麦者,以种植之先后为次:大豆最宜早种,稻、黍、稷(粟)之类,期不甚相远,麻在夏至,次之,麦在仲秋,最居后。”

④ 任文洁、刘兴林:《从卜辞“来”“麦”谈殷商小麦的推广种植》,《中国农史》2021年第5期。

⑤ [清]程瑶田撰,陈冠明等校点:《程瑶田全集(3)》,黄山书社,2008年,第87页。

判断文献中的“黍”究竟是小名还是大名,必须仰赖它所出现的语境。在后世的古代文献中,若“黍”“粟”并举,则“黍”“粟”皆为大名,是两种作物,其中“黍”的下位概念包括糯性的“黍”(小名)和非糯性的“糜”(小名);若“黍”“糜”并举,则“黍”“糜”皆为小名,分别专指糯性和非糯性的黍。

与后世一样,殷商时代的“黍”有时可能是指糯性黍与粳性黍的共名,即大名;但也时常用作适用于酿酒的糯性黍的专名,即小名。甲骨文中的“黍”多指糯性黍。甲骨文中常见到就“黍”的收成是否影响到商王的宴饮、祭祀等用酒的占卜记录,有一片甲骨(《合》10137 典宾)上竟然记录了这类占卜多达18次;甲骨文中又常见“黍”“酒”连文之例。这些语例足见这些“黍”是适用于酿酒的糯性黍,是小名而非大名。甲骨文中的“黍”多是指糯性黍,体现出殷王对制“酒”主料的极端重视。

甲骨文频频记载糯性的“黍”,却使得非糯性的黍类晦而不显,貌似殷人还没有严格区分出这两种不同的黍,但这是一种错觉。甲骨文中“白黍”,又见于传世文献,它指的是颜色较糯性黍米浅的粳性黍。“白黍”有幸见于甲骨文,或许是因为殷人尚白的缘故。甲骨文中又屡见“登焦(稊)”(见于《合》33154 历二、34600 历二、32834 历草、21225 师小字,《屯》51 历二)^①，“焦(稊)”是一种粮食,据考这种粮食是一种不黏黍(非糯粳型黍)^②。甲骨文格外重视糯性品种的粮食作物和谷物,这里却用非糯的黍进行祭祀,大概率是因为这种黍属于《齐民要术·黍稷》所记载的收薄、难舂但味美的特殊优良品种。

与非糯黍米、糯黍米相比,非糯稻米、糯稻米之间的外在差异更显著,殷商时人能够严格分辨非糯黍米、糯黍米,非糯稻米、糯稻米不应当还没有被严格地区分出来。

殷人似乎对粟类谷物也能够严格地区分其种质的糯性与非糯性。“汙(梁)”^③,是一种糯性粟,在甲骨文中凡四见。更何况,西周初年已经出现了表示糯稻专名的文字,它不太可能是在周革殷命后立即出现的。有学者认为,《夏小正》中的“荼”即是后世的“稌”^④,如果“荼”之义与后世的“稌”相同,表示糯稻专名的文字要提到商代以前。当然,其说是否可靠,待考,但殷商时期已经出现表示糯稻专名的文字是非常可信的。

现存殷商时期的传世文献几乎是零,这一时期各方面的状况往往只能依据西周时期的文献进行推测。现存涉农甲骨文献全部都是商代晚期的,如果有可能,使用西周初年的文献进行推测是最佳的选择。表示“‘糯’之义”的糯稻专用字“稌”在西周初年已经出现,“糯”实际上是“稌”义同音近的同源字,甲骨文中暂未发现真正的“稌”字,而曾文惠示的所谓的“稌”字,根据清晰的拓片,其实并不从“禾”而是从“黍”,是“黍”的异体字^⑤,但糯稻专用字不太可能是在周革殷命之后立即出现的,殷商时期不太可能还没有糯稻专用字。

(二)从汉语史的角度来看,N是甲骨文中的“糯”

1. 先行成果梳理:N是与酒有关的农作物,可隶定为“糴”

近百年来,数十位学者针对N的考释问题提出了20多种看法,有一定影响的有:

①1915年,罗振玉先生释为“酋”,谓之“象酒盈尊”,未将之视为一种农作物。②1924,叶玉森先生隶定为“糴”,谓之“象酿酒之时米麴西泽之形”,也未将之视为一种农作物。③1933年,瞿润缙先生释为“酋”,以其引申义为“多”,谓其义为“多禾”。④1933年,商承祚先生释为“酋”,谓其义为用来酿酒的农作物“黍”。⑤1934年,唐兰先生释为“稻”。⑥1939年,金祖同先生释为“粟”。⑦1954年,杨树达先生释为“糴”。⑧1956年,陈梦家先生释为“秬”。⑨1956年,钱穆先生对影响最大的唐说提出质疑,以为是米

① 周忠兵:《释甲骨文中的“焦”》,《文史》2014年第3期。

② 黄锡全:《金文中的“稻稊糯粱”略议》,《古文字研究》2020年第1期。

③ 王子杨:《甲骨文字形类组差异现象研究》,中西书局,2013年,第326页。

④ 杨竞生:《论〈夏小正〉中的粮油植物》,载本书编纂组:《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农业出版社,1980年,第289-303页。

⑤ 王子杨:《释黄组卜辞特殊写法的“黍”字》,《汉语言文学研究》2021年第2期。

粒长而大的作物,未必是“稻”,但未给出具体的考释结果。⑩1956年,李平心先生没有给出具体的考释结果,但认为这个字代表的是小麦。⑪1957年,于省吾先生释为“菽和豆”的佚字。⑫1959年,饶宗颐先生释为“糲”,是《集韵》中所说的“糲”。⑬1979年,康殷先生单纯从字形考虑,认为该字除去“米”的部件“象一敞口尖底的酒瓶,罍(坛)形”,后因讹变,“米”省去,是“厚”字。⑭1991年,谢元震先生释为“稷”或其同义字。⑮1995年,李璠先生释为“酿”,认为该字“米入酒器”之象。⑯2001年,贾文先生释为“穀”,认为该字代表的是“粟”的专称。⑰2008年,曾雄生先生从唐兰之说,释为“稻”,也认为该字上部为“米”,但认为其下部表示装米的筐;同时还认为D也是甲骨文中的“稻”。⑱2018年,谢明文先生虽未给出具体的考释结论,但他认为该字不是“稻”。⑲2022年,笔者释为“糯”,也认为该字上部为“米”,认为其下部是表示酒罍。⑳2022年,曾雄生先生改从陈梦家先生之说,释为“秬”,也认为该字上部为“米”,也没有否认其下部表示的可能是酒罍。

N常与一个农作物专用字的D对贞,都以“受某年”的固定格式出现,显然也是某一具体农作物的专用字^①。以上诸说,①②③⑬⑮四种看法没有考虑到甲骨文的辞例,遂未把N看作为一种具体农作物的专用名称,其考释结果早已无人信从。2012年,裘锡圭先生非常中肯地评论了诸家之说。他指出,说法①⑥“由于缺乏证据,早已不为世人所信”。比较有影响的有唐兰、陈梦家和于省吾诸君提出的第⑤⑧⑪诸说^②,在古音方面的证据都不够坚强,其中说法⑧就连提出者都自称“不能肯定”是否正确,说法⑪提出者后来编定文集时没有收入此说,大概已经放弃了,而唐兰先生提出的影响最大的说法⑤恐怕也不能视为定论。

各家之说虽然千差万别,但大多趋同于将之与殷商时期的酒品联系起来,经考察笔者也深以为然。其中,唐兰提出的N为“稻”之说在赵锡元先生提出D为“稻”之说之前,是在赵说提出之前影响最大的说法。深入考察N的字形及其在甲骨文中的辞例、出土文物,笔者发现,各家之说,特别是唐说,确有不少值得吸取的合理因素。就字形而言,现今人们一般将N可以隶定为“糲”;裘先生将N隶定为“𥽿”更准确,因不便于编排,很少见用,但能表明N所从之“覃”并无上面的部件“西”(𠂔)。

2.N的形音义补说:多方证据指向“糯”而非“秬”或其他

甲骨文的考释,必须过字形关。过不了字形关的考释结果,都是不可信的。N的下部是形如酒罍的酒器之象,上部从米,现今在古文字学界已不见有争议。

曾文提醒,曾有论者指出N的下部或许是装米的筐。这种说法产生于甲骨文研究的早期阶段,不可信。甲骨文、金文象形程度较高,但这些文字及其组成部件中都没有出现形状如此且表示筐的文字;现已出土的先秦时代的筐或其他筐类工具也有不少,但没有一个是这种形状的。况且使用这种底部如此尖锐、颈部如此狭小的筐来装米,是不可思议的。N的下部,显然不是装米的筐。西周金文“簞”字是竹席的意思,部件“早”(𠂔,即除去上面声符的“覃”)在《毛公鼎》中作“𠂔”,这是一种近义替代现象,表明“覃”确实是一种能盛放液体的器皿,不是竹子或植物枝条编成的筐子。“𠂔”在商周春秋时期是盆一类盛放液体的器皿,春秋青铜器曾太保庆皿与曾太保盆形制相同就是明证。

N是形声兼会意字,从米,从𠂔(不带声符的“覃”),𠂔亦声,这是可信的。唐兰、于省吾诸君亦持此说。今人多将之隶定为“糲”。

“糲”见于《说文·米部》:“糲,糜和也。”《说文》所给出的释义显然不是其本义。《广韵·覃韵》:“糲,糲也。”《释名·释饮食》则云:“糲,黏也。”“糯”在西周金文中不从“米”,写作“需”,指黏性的稻米,即糯米。可见“糲”之义直至后世与“糯”仍有相通之处,此或为甲骨文“糯”的初文佚字在后世的孑遗。又《集韵·勘韵》云:“糲,淖糜(稀饭)。”而从今人以古法酿制的醴酒来看,这种酒在未经过滤时正与稀饭相似,“呈

① 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释禾·年》,载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250页。

② 裘锡圭:《甲骨文中所见的商代农业》,载裘锡圭:《裘锡圭学术文集第1卷·甲骨文卷》,第233-269页。

粥糊状”^①，是黏稠的流质。

古有“粘”字，其语源为“黏”，其语义为糯稻，与“糲”音近可通，与“糯”同源。《玉篇·禾部》云“粘，音黏，禾也”^②，谓“粘”为“禾”之一种，但未指明为哪一种禾。大多数禾本科粮食作物都可称“禾”，但一般的辞书都将“粘”训为“糯稻”，这是可信的。《字汇·禾部》云“粘，糯禾”，明确指出此禾为“糯禾”；清张古甫《三农记·稷稻》云“粘者，糯也，堪作酒”，谓之为所产之米“堪作酒”的糯稻。自古以来，从“覃”之字与从“占”之字相通之例甚多，表明二声系之字音近（甚至音同）可通的最有力的证据，莫过于许慎给“簞”的初文“𠂔”的注音：“𠂔，读若沾。”“糯”及其异体字“糲”皆属“而”声系字，蒙孟蓬生先生惠示，从“而”得声的“𠂔”字声系字在上古可能有闭口韵，与“占”声系字音近（甚至音同），收入《广韵·沾韵》就有“𠂔”“𠂔”“𠂔”三字。“糯”“粘”“黏”“糲”为同源字，音近义通。笔者当初也曾经考虑过把N称作甲骨文中的“粘”字，但最终放弃，一是因为考虑到“粘”字不如“糯”字常见，称N为甲骨文中的“糯”更便于读者理解；二是因为资料表明“糲”“糯”二字在上古音近可通。很多时候，我们无法从现代汉字中找出一个与甲骨文音形义各方面都完全对应的文字，只能找出与之语义相同或相近的文字，说某字是甲骨文中的某字。如甲骨文中的“𥽿”字，是个形如蟋蟀的象形字，这并不妨碍我们将之称为甲骨文中的“秋”。

N整个字所会意的是，确如唐兰所言，置米于罈而酿酒的形象。殷王造酒一般用糯性米，虽然非糯稻米也可用于酿酒，但在古代的技术条件下酿造困难、出酒率低、风味不佳，难入殷王的法眼。多个种类的糯性米都可以用作造酒的主料，其上所从之“米”，用来造酒的究竟是何种糯性米呢？可纳入我们考虑范围的粮米有：大白米类粮食（稻米）、大黄米类粮食（黍米）、小黄米类粮食（粟米）^③、豆米类粮食、稗子米类粮食、其它粮食。豆米类粮食因含油量高而不宜用于酿酒，首先可以排除。稗子米类粮食可用于酿酒，但它原产非洲，在我国文献中出现的时间偏晚，用作酿酒的主料出酒率很低，酿出的酒风味不佳，商代即使有稗子的种植，稗子酒也难入殷王的法眼，更不可能频频出现在甲骨文中。其它粮食如麦类，在甲骨文中也偶见有被用于造酒的记载，但无论是从考古资料还是文献记载来看，这种情况并不多见。小黄米类粮食酿的酒，风味要比大黄米类粮食酿的酒差一些；大黄米类粮食酿造的酒，特别是醴酒，其风味要比大白米类粮食要差一些；在大白米类粮食中，无论是从酒的风味还是出酒率、酿造的难易程度来看，都是以糯稻米为最佳，而在糯米之中又通常以产于北方的粳糯为最佳、以产于南方的籼糯稍次。甲骨文大多是殷王王室的占卜记录，所记粮食作物多是能够生产出商王御用粮的植物，所以糯性小黄米酿造的酒自然难以进入他们的法眼；糯性大黄米酿造的酒虽深受殷王喜爱，但就醴酒而言，其风味终究比不上糯性大白米酿造的。“殷尚醴”，糯性大白米类粮食酿造的“稻醴”的风味比糯性大黄米类粮食酿造的“黍醴”、糯性小黄米酿造“粱醴”好。而与N对贞的D是稻，所以N不太可能是与之完全相同的农作物稻；作为一种出现频率很高的常见农作物，它只可能是一种能够产出最适宜在当时技术条件下酿酒，并且风味最好的稻米的水稻类型。结合西周金文以及秦汉言稻常及糯的语言习惯、殷商尚醴的习俗，笔者将N释为“糯”（详后）。

于省吾先生提出的N是“豆或菽”的初文佚字之说，后来提出者本人都放弃了，但还有人信从其说，或许是因为豆类作物是商代遗址中出现较多的重要作物之一。其实，豆类作物直至中古时期仍然只是“可备凶年”的备荒之谷，不太可能在殷商时期就已经成为商王经常食用的御用食粮，在甲骨文中没有频频出现它的专用字也很正常。不过，甲骨文中还是有“豆或菽”的踪影，出现过借“叔”作“菽”之例。这或许也可说明N不是“豆或菽”的初文。

① 王克明：《浊酒一杯说醴》，《博览群书》2008年第10期。

② 例承孟蓬生先生惠示。孟先生有未刊稿《说文“𠂔（簞）”字音义疏证》。

③ 稻米不皆为白色而以白色最常见，黍米与粟米不皆为黄色而以黄色最常见，故分别以“白米”“黄米”称之。

3. 稻、糯及其他相关文字的用例:释N为“糯”符合上古辞例、古今汉语惯例

曾先生或其他资深稻史专家反对鄙说,我们都不应该感到意外。有一种由来已久且至今仍然在一定范围内流行的看法:“稻”本指糯稻,“糯”等糯稻专用字是出现很晚的后起字。

“稻”本指糯稻之说的主要依据是:《谷梁传·襄公五年》载有鲁译吴国地名“善稻”,并解释道:“吴谓‘善’‘伊’,谓‘稻’‘缓’。”前辈学者或以“缓”“糯”有双声音转的关系,结合这一资料便得出“稻”本是糯稻专名的结论。此说不为无据。笔者此前也部分地认同过此说,但经进一步考察,我们发现实情恐非如此。古代交通不便,方言比现今要复杂得多,当时吴方言谓“稻”为“缓”,恐系巧合,并不具备普遍意义。鲁译地名“善稻”,秦译则作“盱眙”,于其说不利。再者,《周礼》的成书年代与《谷梁传》接近,其中有稻人以种植有芒作物为职责的记载^①,而上古糯稻几乎全部都是无芒的^②,说明上古官方通语中“稻”绝不是指“糯”(糯稻的专名)^③。不可否认,“稻”与“糯”“稌”诸字的上古音确实接近;不过,纵使它们古音全同鄙说仍可备为一说。曾先生此前认为D、N都是“稻”字,是颇具启发性的卓见。假设二字古音全同,D、N则可视作“异体专用”之类的现象^④,即D指普通的稻或稻类的共名,N则专指糯稻。

“稻”本指糯稻之说的另一个重要依据是,《说文》中“稻”“稌”“稭”互训。《说文·禾部》云:“稻,稌。”又云:“稌,稻。”“稭,沛国谓稻曰稭(糯)。”用今人的眼光来看,三字互训,则其语义自当完全相同,“稌”是糯稻的意思,则“稻”也是糯稻的意思。但是古人“互训”常以概念内涵外延不同的字词来互相解释,如《艸部》云:“菅,茅。”又云:“茅,菅。”“菅”(Themeda villosa (Poir.) A. Camus)与“茅”(Imperata cylindrica (L.) Beauv.)两种植物外形相似,但不是同一种植物,前者属于菅属,后者属于白茅属,它们比“稻”与“糯”的差别还要大。《诗经·豳风·七月》“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似乎可以印证“稻”是糯稻的专名,因为酿酒用米一般用糯稻米,但是糯稻米用稻类的共名“稻”来称呼也是完全可以的,而且此处只有用“稻”而不用语义更为精确的“稌”“糯”才能避免失韵。用“稻”可以与“酒”押韵,二字上古音皆在侯部;若用“稌”“糯”则失韵,此二字上古音一在鱼部,一在元部。《诗经》中“稌”仅1见,而“稻”凡5见,除了前揭之例以外,尚有《唐风·鸛羽》“不能蓺稻粱”、《小雅·白华》“浸彼稻田”、《小雅·甫田》“黍稷稻粱”、《鲁颂·閟宫》“有稻有秬”,这些“稻”显然都没有理由将之判定为糯稻的专名,恐怕都是稻类的共名或非糯稻的专名。

从传世文献来看,“糯”等糯稻专用字似乎是出现很晚的后起字:“糯”始见于西晋吕忱《字林》,其异体字“稭”始见于东汉许慎《说文》,且作为沛国方言用字出现的^⑤。但从出土文献来看,“糯”等糯稻专用字既不始于西晋,也不始于东汉,至迟在西周就已经出现,秦汉文献中也不乏其例,且都不是作为沛国方言出现的。西周金文中就出现了表示糯稻专名的“需”(糯),经常与“稻”并举。

《鲁叔盂》《伯公父簠》皆自述其功用是“用盛稻、稌、需(糯)、粱。”一般认为,“需(糯)”指的是糯稻米,这是可信的:

《鲁叔盂》《伯公父簠》“稻、稌、需(糯)、粱”,其中,“稌”^⑥通“稻”^⑦,指的是一种粳性黍(不黏黍)^⑧;“粱”

①《周礼·地官·稻人》介绍“稻人”的职责是“种之芒种”。

②在宋代以前甚至此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的糯稻无芒,粳稻有芒,鲜有例外。宋人罗愿说:“稭则有芒,至糯(糯)则无。”(《尔雅翼》卷1《释草》)明人黄省曾说:“糯无芒,粳有芒。”(《稻品》不分卷)现今糯稻也存在有芒者,是晚近以来的品种,宋明以前,特别是宋代以前,极少有例外。

③《周礼》是东周士人在周代旧典的基础上略加以损益而成,所据资料系官书,故书中“稻”当系通语而非方言。

④详参刘兴林:《甲骨文田猎、畜牧及与动物相关字的异体专用》,《华夏考古》1996年第4期。

⑤游修龄、曾雄生:《中国稻作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59页。沛国,今安徽淮河以北,西淝河以东,灵璧、萧县及其以西,河南夏邑、永城,江苏沛县与丰县及其以南地区。

⑥张新俊:《单叔父盂“稌”字补说》,《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2020年第1期。

⑦平心:《释稌稌》,《学术月刊》1957年第10期。

⑧黄锡全:《金文中的“稻稌糯粱”略议》,《古文字研究》2020年第1期。

指的是糯性粟(黏粟)^①;“需”(糯),各家通常认为是指糯稻米,未见有证其伪者。将“需”读为代表糯稻米的“糯”,则二字为谐声通假关系,可信度高。秦汉出土文献亦不乏其例。里耶秦简云:“需(糯)米百卅六。”谓铭文中的“需”为糯稻米之说似乎具有排他性:因为“粱”为糯性粟,则“需(糯)”必不为糯性粟;又因为糯性黍以“黍”名之,则“需(糯)”必不为糯性黍。“需(糯)、粱”皆为糯性粮米,而“稊”为非糯性粮米,则其上“稻”亦当为非糯性粮米。青铜器的器主都是达官贵人。下层的奴隶平民对糯稻米和非糯稻米是否有严格区分尚不可知,但考虑到祭祀是上古时代的大事,而《山海经》所记南北多地祭祀每每以“稌”(糯稻米)为祭品,西周乃至殷商的那些特别注重祭祀的达官贵人应有严格的区分。

不能忽略的是,兽叔盨、伯公父簋的发现地分别是河南省三门峡市上村岭墓葬和陕西省扶风县云塘村西周窑,此二地后来都不在东汉时沛国的辖境之内。这说明,至迟在西周时期“需(糯)”都是通语用字,还不是方言用字。以往人们根据《说文》的记载,断定最初“稌”(糯)作为东汉才出现的方言用字,并不可靠。《说文》去殷商、西周已远,对涉农涉酒用字的训释问题较多。与伯公父簋同一器主的青铜器有伯公父壶,其自述为“醴壶”,不难揣测伯公父曾用“糯”酿造醴酒。

由于上古方言复杂、文献不足,商周“稻”“糯”之真义确实是农史研究的一大难点。似当以陈初生先生的看法最为近是^②。陈先生认为,西周金文中的“稻”字在作为粮食名称时,有2个义项:①稻类的共名,即“大名”;②特指不黏稻,即非糯稻的专名,亦即“小名”。当“稻”与“需(糯)”并举,二者皆作为“小名”使用,分别指非糯稻米、糯稻米。宋人慈贤把“稻、糯、大麦、绿豆、油麻”并称为“五谷”(《妙吉祥平等观门大教王经略出护摩仪》卷1)。今人口语和书面语中,类似古代“稻”“糯”并举的现象也不罕见。如①“加价比例:小麦‘倒三七’,水稻、糯稻按‘倒二八’。”③②“那水稻和糯稻连绵不断。”④③“在经济合理条件下,发展口感佳、透明度好、营养全的水稻及糯稻。”⑤④“优质水稻及糯稻订单种植100万亩以上。”⑥⑤“中香农科进入迅速发展阶段,在香型水稻、糯稻等方面科研优势明显。”⑦从“而”与从“余”^⑧得声之字多有“黏”“𥽿(软)”之义,而从“𥽿”得声之字则不具备这一条件,所以“稻”之本义当是非糯稻或稻类的共名,而“糯”“稌”之本义是糯稻。

“稌”“糯”是义同音近的同源字。汉许慎《说文·禾部》为“稌”作训:“沛国谓稻曰稌(糯)”;晋郭璞为《尔雅·释草》“稌”条作注云:“今沛国呼稌。”许慎、郭璞谓沛国方言在汉、晋时期称“稻”为“稌”“稌(糯)”。然而,“稌”“稌(糯)”的声符可以看出它们的本义都是糯稻,沛国方言反而称非糯性的“稻”为“稌”“糯”,这是一种方言中习见的张冠李戴现象。类似的情形还见于其他农作物中。如,一般糯性黍称为“黍”,粳性黍称为“糜”,但也有一些方言称糯性黍为“糜”。许慎、郭璞所记“稌”“稌(糯)”虽是方言现象,但二者的上古音十分接近却是事实。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据此指出:“‘稌’‘稌’本一语,而稍分轻重耳。”^⑨许慎、郭璞所言虽系汉晋方言现象,但仍可由此窥知“稌(糯)”“稌”音近义同。上古辞书释义以及所记方言中张冠李戴现象时有发生,但所记古音资料可信度很高,是可以援以为据的。

① 徐海荣主编:《中国饮食史(卷1)》,杭州出版社,2014年,第350页。《资治通鉴·汉纪二十九》“种五粱禾于殿中”,胡三省注引汜胜之曰:“粱,是秠粟。”王祯《农书·百谷谱》“粱秠”类中,对“白粱”有详细记载。

② 陈初生:《稻需考》,载中华书局编辑部等:《古文字研究(第13辑)》,中华书局,1986年,第451-457页。

③ 孟宪民、于永跃主编:《粮食商业财务管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72页。

④ 思妃主编:《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100人:王安石、李纲》,吉林摄影出版社,2004年,第182页。

⑤ 彭珂珊:《加入WTO后中国粮食问题观察》,《粮食问题研究》2003年第3期。

⑥ 张海波:《以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为指导努力建设更高标准 更加全面小康社会》,《农场经济管理》2017年第10期。

⑦ 乐明凯:《中香农科新三板上市记——湖北首家试水资本市场种企深度扫描》,《种子科技》2015年第9期。

⑧ 黄金贵主编:《古代汉语文化百科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6年,第379页。

⑨ [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322页。

二、与D同卜的J代表一种农作物,是甲骨文中的“秬”

(一)先行成果梳理:J是农作物,造字原理尚未完全明确

现今见于西周金文中的、能够窥知相关谷物是否具有糯性的“𥽿”“梁”“稻”“需”(糯)这四个专用字中,各字都有学者从甲骨文中揭出,除了“糯”字为何的争议最大,其他各字不见有争议或争议罕见。也有论者认为J是甲骨文中代表糯稻的“糯”或代表稷稻的“稌”字,抑或是代表粟的“齋”字,或代表高粱的某字。各家之说皆有可商之处。

前文所揭宾组卜辞(《合》9946 宾一)频频以“受J年”与“受D(稻)年”同卜。已有学者就J的考释问题做出过宝贵的探索,但目前为止,该字的造字原理尚难以判定。J下部从田,田显然是其义符;至于上部的𠂔(𠂔),有人认为它是单纯表音的声符,有人认为它是单纯表意的义符。因此,有人认为J是形声字,有人认为J是会意字。

1. 形声字说

(1)“稌说”

温少峰、袁庭栋诸君认为J是从余从田的“畚”字,读为稌^①,义为稷稻,影响较大,但经不起推敲。沈志忠先生指出,甲骨文之余字的𠂔、𠂔写法,与𠂔相去甚远,J字释“稌”不可信^②。沈先生的看法十分正确。在同版甲骨上,余与作为部件的𠂔的写法都明显不同(《英藏》80)^③。此外,甲骨文中既有贞人余;又有贞人𠂔,二者不是一人,写法也迥然有别:贞人余共出现24次,写法多样,但没有一例写成𠂔形的^④;贞人𠂔共出现2次,分别写作𠂔(《合》4177)𠂔(《英》2508)。𠂔字还见于宾组(《合》13940)、宾出组(《合》7836)、出组(《合》24951)和午组(《合》22092)甲骨,写法虽有差别,但都和余字绝不相类。因此,可以确定𠂔不是余字,J字并不从余。金文中“余”的写法也与之相去甚远。温、袁二君列举的最与之接近《豆闭簠》《小臣觶犀尊》《黄甫父盘》《俞伯尊》“觶”的部件“余”,其实也不与之接近:在这四件青铜器上,所谓的“觶”分别写作𠂔、𠂔、𠂔、𠂔。

(2)“稷(糯)说”

贾文先生在“稌”说的基础上提出“稷(糯)”说。贾先生也认为J的上部字形与《豆闭簠》诸器相关文字的部件相同,但认为J上部不是“余”而是“俞”字,读为“稷(糯)”,义为糯稻^⑤。由于温、袁二君对相关部件的字形认识并不准确,故而在以此为据而形成的贾说也可不信。

(3)“粟说”

陈梦家先生认为J字所从的𠂔跟甲骨文𠂔(齊)上部相似,将之隶定为“𠂔”,怀疑该字是从田、齊(齐)声的形声字,是在《说文》中出现的并被后人训为“稷”的“齋”(稷,即粟)^⑥。

J都是从一𠂔,没有如甲骨文“齊”写作从一𠂔的,所以陈说并不可信。

① 温少峰、袁庭栋:《殷墟卜辞研究·科学技术篇》,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第175-176页。

② 沈志忠:《先秦两汉梁秬考》,《中国农史》1999年第2期。

③ 赵平安:《“达”字两系说——兼释甲骨文所谓“途”和齐金文中所谓“造”字》,载曾宪通主编:《古文字与汉语史论集》,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18-224页。

④ 相关甲骨文编号,详见姚孝遂主编:《殷墟甲骨刻辞类纂》,中华书局,1989年,第1492页。

⑤ 贾文、贾加林:《甲骨文中农作物“稻”“黍”“来”“穀”“稷”的考辨》,《殷都学刊》2001年第4期。

⑥ 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1956年,第525、528、529页。

2. 会意字说

(1) “高粱说”





裘锡圭先生也认为陈说不可信。他认为J不是单纯的形声字,所代表的也并非陈先生所说的“稷”,而是“植于‘田’上的穗大而直的作物”,“与其说成粟或稷,却还不如说成高粱合理^①。”

裘说甚有理据,但关键问题是:殷商时期我国中原地区没有种植过高粱。

早在1931年,就有人声称在我国新石器时期遗址中发现了高粱的遗迹,后来类似的报道出现多次,殷商或更早我国中原地区就已经种植高粱之说曾一度接近于成为定论。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考古学界开始普遍采用国外常用的浮选法对考古遗址中的植物种子进行鉴定,再也没有发现过汉代以前的“高粱”的遗存^②,运用浮选法等手段对此前发现的“高粱”进行重新鉴定,获得的结果都无一例外地令人失望^③。这强烈地昭示着,以往发现的所有的所谓的“高粱”都不可靠。保守地说,殷商时期中原地区并没有值得一提的高粱,因而甲骨文中不可能出现表示高粱的文字。

(二) J当释为“𥽿”:殊途同归的结论

1. 若J为会意字,当释为“𥽿”

陈先生的“粟说”与裘先生的“高粱”说,其结论虽不确,但富于启发性,不乏合理成分。J的上部𠂔确实如穗形,甲骨文、金文和《说文》“齊”小篆都从三𠂔,许慎解释说𠂔是禾麦之类农作物的穗子。甲骨文中“刈”字,写作、、 (《合》18400、9565、9562),虽然也有人释为“获”,但一般都认为此字取像于用刀一类的工具割取禾穗,其中的𠂔代表农作物的穗子。J若为会意字,从字形上看,确实像是“植于‘田’上的穗大而直的作物”,最容易使今人联想到现代常见的粮食作物高粱^④。但是商代我国中原地区没有高粱,或者保守地说没有值得一提的高粱,那它代表的就是当时与高粱在外形上相似的农作物。值得注意的是,在商代农作物中“𥽿”正好与高粱较为相似。至迟从宋代开始就不断有人指出“𥽿”是“高粱”,至今仍有多位学者持有此说^⑤,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在商代的著名农作物中,“穗大”的作物非“𥽿”莫属。田野考察表明,与我国同类的黍属农作物相比,𥽿的植株矮而穗子长,如黑龙江所产之𥽿,是所有样本中主穗长与株高之比最大的^⑥。株矮穗大,至今仍是良种的重要标准之一。就其穗与茎而言能称得上“直”的粮食作物,首先让人想到的是有“高粱黍”之称的密穗型的𥽿黍,不过,常见的散穗型的𥽿从外形上看也是“穗大而直”的。J字上部的𠂔形结构与密穗型𥽿的穗子的轮廓相近,与散穗型𥽿的穗子的轮廓也很相近。也许我们不必拘泥于J字上部是否代表其穗与茎之“直”,商末周初金文中的J字形如J2,上部写作,就没有凸显其穗与茎是否“直”。甲骨文是金文的俗字,一般来说金文字形比甲骨文还要原始,或许它只代表其“穗大”而已。甲骨文中作为独立文字的𠂔也有2例写法与金文相类似(皆见于《合》13490)^⑦。

2. 若J为形声字,亦当释为“𥽿”

甲骨文及其部件,常见“异字一形”的情况,𠂔也可能是“害”,有可能在J中作声符。J字确实也有可能是形声字。

① 裘锡圭:《甲骨文中所见的商代农业》,载裘锡圭:《裘锡圭学术文集第1卷·甲骨文卷》,第233-269页。

② 刘夙:《高粱:从非洲来的“毒品”还是希望?》,《甘肃农业》2015年第19期。

③ 赵利杰:《试论高粱传入中国的时间、路径及初步推广》,《中国农史》2019年第1期;赵利杰:《先秦两汉高粱古名考》,《农业考古》2019年第1期。

④ 其实,高粱的穗型有多种,但常见的粮用高粱的穗子形如𠂔。



⑤ 详见赵利杰:《先秦两汉高粱古名考》,《农业考古》2019年第1期。

⑥ 详参连帅等,《不同生态区糜子种质资源的遗传多样性分析》,《山西农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5年第3期。


⑦ 或释𠂔为卒,然在同版卜辞中,2例𠂔都与卒的写法判然有别(《合》13490),恐非一字。

今考甲骨文中有一字,本文以G代替,它与J字倒有不少相像之处,是为可资比勘佳例:

G1.  (《合》13889 典宾) G2.  (《合》5712 宾三)


G3.  (《补》2298 宾三) G4.  (《补》2298 宾三)

G1的写法与J同样都是上下结构,各家皆以为其上部为声符。G2、G3、G4都是G1的异体字,都是半包围结构,其中G3的声符是◇。弄清G字的声符是什么,也就弄清了J字的声符是什么。以往论者多以为G字的声符是余,将G字视为甲骨文中的匚字^①;刘钊先生以为G字的声符是害,将G字视为甲骨文中的匚(盥)字。刘说现已得到公认^②,近人罗振玉先生也曾殊途同归地得出此结论^③,可信,以下具论其详:


卜辞中常见“ (H)首”一词,若隶定为“途”,难以讲通;汤余惠先生隶定为“遘”,读为“割”,正与古代割牲首祭祀之礼十分吻合^④。该字还写作:

H1.  (《合》6050 宾三) H2.  (《合》6078 宾三) H3.  (《合》32229 历二)

其中H1、H2上部声符的写法与J字的上部较为一致,都写作“◇”;H3的声符的写法与G4的声符一致,都写作“↑”。殷商文字中的“◇”与“↑”是可以互换的异体,如商代《齐乍父乙卣》中有二“齐”字,其一从三“◇”,其二从三“↑”。因此,J若为形声字,其声符完全有可能是“害”。

另有新见西周早期《昔鸡簋》有遘(H)字也可为证。其字写作,该字除了“遘”之外的部件,显然是金文中标准的“害”字。这表明汤余惠先生的判断是正确的,刘先生以此为据而形成的观点是可靠的^⑤。

前列卜辞中常见的“首”前一字(H)的声符正与G1相同,而G3是G1的异体字,因此,J若为形声字,其声符当为“害”。那么,哪种农作物用字的古音与“害”相近呢?

今考西周早期《鞮父簋》有鞮字,写作。鞮本来就是双声字,害、夫都是声符,此字又累加了巨为声符,可见害、巨上古音近可通,故而J字若为形声字,当从田、害声,当读为“秬”,是甲骨文中的“秬”字。“秬”字从禾、巨声,禾、田皆与农作物有关,古文字中常可互相置换。秬的种仁可以用作制造鬯酒的主料,故“秬”在西周金文中多以巨为声符,以鬯为义符;传世文献中又有其异体字“鬯”,从鬯、矩声,矩的声符是巨,这一异体也可视为巨声字。

再从甲骨卜辞内容本身来看,“受J年”与“受稻年”同卜,《诗经》中也有“稻”“秬”并举之例,《鲁颂·閟宫》云:“有稻有秬。”《閟宫》的这一记载是对尧帝的农官后稷“教民稼穡”的粮食作物追述,所以我们说商代的粮食作物“有稻有秬”是不成问题的。当然,也有人把笔者释为稻的甲骨文字释为黍。如果它是黍的话,它与J并卜就更容易解释了。秬与黍是关系很密切的农作物,秬是黍的一个特殊的品种,是黑黍,秬穗巨大,收种时间与普通品种的黍相同,从这个角度来看释J为秬也是很合适的。

J还见于商末周初的《J爵》中。爵是古代盛酒的器具。若释J为秬,则J爵上J字可能用秬是酿造鬯酒(黑黍酒)家族的姓氏或名字,也可能是表明此爵是专门用来盛鬯酒的器具,总之与酒有关,这与爵的功用十分吻合。

① 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第三册,中华书局,1996年,第2193-2194页。

② 李宗焜:《甲骨文字编》,中华书局,2012年,第849页;刘钊等:《新甲骨文编》,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736页。

③ 罗振玉:《增订殷虚书契考释·卷中》,东方学会,1927年,第39页。

④ 汤余惠:《释H》,《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2年第2期。

⑤ 何景成:《新出昔鸡簋與甲骨文“害”字考釋》,《青铜器与金文》2018第1期。

结 语

综上,笔者认为N是甲骨文中的“𥽿”而非“𥽿”或其他,甲骨文中的J无论是形声字还是会意字都应当释为“𥽿”。能否备为一说,聊作抛砖引玉之试,还请曾先生和读者诸君批评指正。

《诗经·大雅·生民》“诞降嘉种,维秬维秠,维糜维芑,恒之秬秠,是获是亩”,毛传:“天降嘉种。秬,黑黍也。”^①《生民》是周人追述其始祖后稷事迹而创作的长诗。所追述的后稷是夏朝尚未建立之时大禹的辅臣,可见“秬”这种被视为“天降嘉种”的粮食作物种植历史久远,认为殷商时期就有人种植“秬”“秠”“糜”“芑”之类的良种作物是没有问题的。秬是一种黑黍,即黍的一种,通常认为是一种黍属农作物的糯性品种。糯性的秬也非常适宜于酿酒。似乎早在此时或稍后,农作物中黍类和粟类作物已经有细密的分类,特殊的良种被赋予了特殊的名称,如在《生民》中,单粒型的黑黍良种叫作“秬”,双粒型的黑黍良种叫作“秠”,初生苗色为赤的粟类作物良种叫作“糜”,初生苗色为白的粟类作物良种叫作“芑”。这体现出当时人们对农作物良种的格外重视。西周晚期金文中有“稻(非糯稻米)、稷(非糯黍米)、需(糯稻米)、梁(糯粟米)”,西周初撰成的《丰年》中有“糯”的同源字“稌”^②,甲骨文中有“稻”、有“稷”、有“梁”,曾先生认为甲骨文中无“糯”以及其他表示具体糯性谷物的专用字,笔者目前还不敢苟同。甲骨文、金文、《诗经》中分别属于《大雅》《周颂》的《生民》《丰年》都出自王公贵族之手,其中所记粮食作物和粮食所体现的都是统治阶级的偏好。糯性谷物品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属于优良品种,特别是对于嗜酒如命的统治阶级来说更是如此。不少谷物都有糯性与非糯性之分,糯性谷物通常要比非糯性谷物更适合酿造美酒,但能产出糯性谷物的作物的产量通常要比非糯性作物低不少^③。除了一些特殊地区外,我国古代的糯性谷物一般供给大富大贵之家日常享用,一般家庭很少有机会享用。殷商甲骨文、西周金文等文献对糯性谷物有较多记载,体现了统治阶级对糯性谷物品种的重视,表现出鲜明的阶级性^④。

[本文承蒙匿名审稿专家和责编同志惠赐细致、宝贵的修改意见,特致谢忱!作者文责自负。]

(责任编辑:徐定懿)

① [唐]孔颖达撰,方向东点校:《毛诗注疏》,中华书局,2021年,第1822页。

② 甲骨文、金文中同源字、异体字现象较后世更为常见。

③ 甚至在改革开放前的我国农村,除了特殊的地区之外,糯性谷物通常都是奢侈品,一般农户种植的糯性作物很少或不种植,富裕的农户会多种一些。据回忆,当年对于一般农户来说,用糯性黍造酒,只是传说中的事情。详见许石林:《舌尖草木》,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2018年,第13页。

④ 曾雄生先生曾指出古人的食物具有普遍存在的阶级性。详参曾雄生:《中国稻史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2018年,第21-22页。